

引言 从“作为方法的中国”到“作为方法的龙狮”

一、时代之问：我们如何认识“我们”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空前复杂、湍流不息的历史节点。这并非一句空洞的修辞，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肤感知的现实。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以其看似不可阻挡之势，将商品、资本、信息和人员编织进一张日益紧密的星球网络，许诺着一个“天涯若比邻”的融合图景；另一方面，一股强劲的本土化、民族主义乃至部落主义的回流正在全球范围内涌现，人们急切地退回至语言、宗教、地域与传统的壁垒之后，高声宣示着“我”与“他者”的边界。这种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悖论之一。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狂飙猛进，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虚拟实在”。在这个由代码构建的疆域里，身份变得流动、多元乃至碎片化。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社群中切换面具，可以同时归属于无数个跨越地理疆界的“趣缘部落”。然而，这种数字化的“解放”也伴随着根系的飘摇与归属感的稀释。当现实的邻里关系被微信群聊取代，当故乡的烟火气被屏幕上的像素所模拟，一种深刻的“失重感”便油然而生。虚拟与现实交错，我们在享受连接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认同焦虑的折磨。

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自身也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文明转型。它背负着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厚重传统，却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现代性的“狂飙”。

古老的智慧与崭新的理念、东方的伦理与西方的范式，在此刻的中国社会中碰撞、交织、融合与博弈。这是一个传统正在被重新发现、诠释与“复兴”的时代，但复兴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现代性框架下的创造性转化。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撕裂与弥合并存”的壮阔画卷：既有价值多元带来的思想活跃，也有共识难寻导致的社会迷茫；既有对宏大叙事的追寻，也有对个体自由的张扬；既有文化自信的蓬勃生长，也有面对未来的深切困惑。

正是在这样一个迷人与风险并存的历史时刻，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如同海床下的礁石，在浪潮退去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紧迫性与现实尖锐性，重新浮现在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面前：在当代，我们究竟如何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在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而淬炼成型的伟大共同体，其内在的凝聚力与生命力，究竟植根于何处，又将展现于何方？

这个“我们”，不再是血缘宗法社会中那个自然而然的“我们”，也不再是帝国天下观里那个“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我们”，更不是近代救亡图存压力下那个同仇敌忾的“我们”。今天的“我们”，是一个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下、在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的语境中、在多元价值共存的格局里，被重新想象、重新建构和重新体认的现代共同体。

官方的叙事为我们勾勒了宏大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蓝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认同坐标。从“多元一体”的民族论述，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这些顶层设计如同灯塔，指引着前行的方向。历史的书写，则

试图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与文物中，梳理出我们这个共同体形成、发展与壮大的史诗，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纵深性与合法性。而理论的建构，无论是来自政治学、社会学还是文化研究，都努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逻辑严谨的学理支撑。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种真正坚实、可感、可触、可融入血液的共同体意识，绝不仅仅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塑造与灌输。它若想获得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内在于日常生活的千百万人的具体实践与亲身体认。它需要从宏大的“史诗”转化为温润的“家常”，从抽象的“概念”沉淀为具身的“感受”。否则，它便可能沦为悬浮在半空的楼阁，虽则壮丽，却与大地缺乏坚实的连接。

因此，在理论与现实、顶层设计与生活世界之间，我们需要一座桥梁，需要一个转换器。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方法”，一种能够让我们穿透概念的迷雾与宏大叙事的抽象性，直接触摸到共同体鲜活的血肉、感知其强劲脉搏的路径。这种方法，应该能够将高悬于庙堂的叙事，与涌动在民间的实践连接起来；应该能够将书写在纸上的历史，与流淌在身体里的记忆贯通起来；应该能够将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与源于传统的文化基因结合起来。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从具体、鲜活的文化实践中，“生长”出对共同体理解的方式。它不应是纯粹哲学的思辨，而应是充满烟火气的观察；不应是静态的结构分析，而应是动态的过程呈现；不应是外部的客观描述，而应是内部的“同情之理解”。这正是本书试图探索的核心。我们试图寻找并践行这样一种“方法”，以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之

问，提供一种来自文化实践深处的、充满生命力的回答。而我们的思想旅程，将从一句在东亚思想史上激起持久回响的著名论断开始——“作为方法的中国”。

当我们追问“我们是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关于自我定义的伟大探险。这场探险的复杂性在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丰富和成熟的有机体。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精辟地指出了其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与整体认同的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在实践层面，这种“一体”感如何超越地域、方言、习俗的差异，成为一种真实不虚的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始终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被建构和强化的过程。

尤其是在当前信息爆炸、观点纷杂的“后真相”时代，个体往往被抛入一个充满矛盾的信息场。一方面，我们接收着关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宏大信息；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又充斥着各种解构权威、强调差异甚至煽动对立的声音。这种信息的“内战”，使得许多人在认同问题上感到困惑与疲惫。他们渴望一种能够超越话语争执的、更为本源和直接的归属感。

这表明，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理”的贯通，更需要“情”的共鸣；不仅需要“知”的确认，更需要“身”的体验。官方叙事、历史书写与理论建构，主要作用于我们的“理”与“知”。而那个更为基础的、源于生活世界的“情”与“身”的层面，则需要一种不同的路径来触及。这正是我们强调“自下而上”和“日常生活”的原因所在。所谓“自下而上”，

意味着我们的视角要从国家层面的宏大设计，转向民间社会的具体运作；要从知识精英的理论创造，转向普通民众的文化实践。在那里，共同体意识不是被教导的教条，而是被践行的伦理；不是被宣传的口号，而是被分享的情感。所谓“内在于日常生活”，意味着我们要在那些看似普通、重复，甚至琐碎的民俗活动、节庆仪式、娱乐休闲中，去发现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密码。正是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文化最为深厚的土壤，它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塑造着人们共同的时间感、空间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从而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将无数个体凝聚成一个“我们”。

因此，本书所探寻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从生活实践中萃取理论智慧的方法。它要求我们谦卑地俯身，去倾听民间的鼓点，去观察节庆的欢腾，去理解那些看似“非理性”的仪式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整合与情感凝聚功能。我们坚信，在中国的文化肌理中，存在着无数这样的实践瑰宝，它们如同散落在历史河床上的金沙，静静地闪烁着共同体智慧的光芒。而其中，龙狮——这一融合了体育、艺术、仪式与信仰的综合性文化实践——无疑是最为璀璨、最具动感、也最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之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完美地具备了成为我们探寻共同体意识之“方法”的潜质。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摆脱那种将研究对象视为被动客体的惯性思维。这正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一命题，为我们提供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它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大门。我们的旅程，即将从思想的云端，降落到龙狮舞动的、充满生命律动的大地之上。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首先回顾这一思想遗产，然后郑重地提出本书的核心命题：“以龙狮为方法”。

二、思想的航标：“作为方法的中国”

要理解“以龙狮为方法”的深刻意涵，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照亮了我们前行道路的思想航标——日本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先生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一震撼性的命题。其初衷，是为了对抗当时日本学界弥漫的、以西方近代化为唯一尺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在沟口看来，将中国仅仅视为一个等待被西方理论分析和解释的“对象”，无异于削足适履，遮蔽了中国历史内在的、独特的演进逻辑与价值体系。这一命题，如同在迷雾重重的思想海峡中竖起的一座灯塔，其光芒不仅重新定义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也为所有非西方文明如何认识自身，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范式。

（一）命题的诞生：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枷锁

任何伟大思想的诞生，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对其所处时代困境的深切回应。沟口雄三提出这一命题的初衷，直接指向了当时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知识界弥漫的一种思想痼疾——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全力投入“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社会转型投射在学术领域，便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甚至是不言自明的研究范式：以西方的近代化道路为唯一的、普世的尺度，来衡量和评判所有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这种范式下，“近代”被

等同于西方所经历的一系列特征：个人主义、理性至上、资本主义民主、市民社会等等。而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则被置于这条“标准”跑道旁，被审视、被度量，其价值似乎仅仅在于它为何“偏离”了这条跑道，为何“延迟”了进入现代世界的时间。于是，中国研究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国被客体化、他者化，成为一个巨大的、有待用西方理论工具进行解剖的“问题”或“对象”。它的历史脉络、社会结构、思想流变，只有在印证或偏离西方理论的范围内才具有意义。这种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学术实践——为了将中国这只独特的“脚”塞进西方理论这只“鞋”里，不惜砍掉其不合规格的、充满活力的部分，从而严重遮蔽了中国历史内在的、自发的、独特的演进逻辑与价值体系。沟口雄三所反抗的，正是这种将活生生的文明简化为冰冷案例的、充满知识霸权的观察视角。

（二）“作为方法”：一场认识论的革命

“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一命题的震撼性，在于它发起了一场根本性的认识论革命。它实现的，是从“客体”到“视角”，从“对象”到“方法”的哥白尼式转换。

从静态客体到动态视角：它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躺在解剖台上的、静止的、被动的客体，而是将其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生产性的视角和出发点。中国，不再是我们“看向”的目标，而是我们借以“观看”世界的“眼镜”。这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用中国的事实验证某个西方理论的正确与否，而是要通过深入中国自身的肌理，提炼出属于它自身的概

念、逻辑和问题意识。“中国之镜”的反射功能：通过这面“中国之镜”，我们不仅要更真实、更贴切地重新认识中国自身，更肩负着一项更宏大的使命——重新审视欧洲、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的“乡绅自治”“田底田面权”或是“天下观念”时，我们便获得了一个外在于欧洲的、坚实的立足点。从这个立足点回望，那个曾经被视为“普世”的欧洲近代化道路，便会显露出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历史偶然性。这正是“相对化”的过程——通过将“西方”从一个绝对的、不言自明的“标准”，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可比的“案例”，我们得以打破其话语垄断，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元可能性与文明演进的不同赛道。探寻“基体”与内在逻辑：沟口雄三强调，要深入中国历史的“基体”中进行考察。所谓“基体”，指的是一个文明长期形成的思想、制度、社会结构的深层复合体，它构成了该文明发展变化的“底色”与“河道”。研究中国，就必须尊重其内在的“剧情发展”，看它自身是如何在前后相继的逻辑中，处理土地、权力、教化等核心问题，而不是拿着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剧本，去质问中国为何没有上演同样的戏码。

（三）命题的精髓：主体性的重建与内在视角的确立

这一命题的全部精髓，可以凝结为两个核心：主体性的重建与内在视角的确立。

主体性的重建：对于一个文明而言，主体性意味着思想上的自立与精神上的自信。它要求文明的研究者（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必须首先悬置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外部标准，尝试从该文明主体的感受、困

境与追求出发，去理解其行动的合理性。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必然包含着对其自身“基体”的创造性转化，而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内在视角的确立：这与主体性重建是一体两面。它要求研究者“潜入”文明的内里，像学习一门活的语言一样，去掌握其独特的“语法”与“词汇”。要理解中华文明，就必须深入其经史子集的典籍，也必须走入其婚丧嫁娶的民俗，从其自身的脉络和日常的实践中，寻找解读它的密码。这是一种“同情之理解”，是试图成为“内部人”的努力。

（四）从思想高塔到实践大地：为何需要“龙狮”作为方法？

沟口雄三的命题，为我们搭建了一座高耸入云的思想高塔，让我们得以俯瞰被“西方中心主义”迷雾所笼罩的学术地图。然而，一个以整个“中国”为尺度的方法，固然宏大而深刻，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解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具体而微的时代课题而言，它仍显得有些抽象与遥远。

“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包含着浩瀚的历史、广袤的地理、多元的族群和阶层。我们如何将这样一个宏大的“方法”落实到可操作、可感知的研究实践中？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具体、更鲜活、更富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来践行这种“方法”的精神？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孕育于千百年来的共同生活、共同实践与共同情感之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到那些能够凝聚和体现这些“共同性”的文化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因此，本书郑重

提议：让我们“以龙狮为方法”。这绝非放弃沟口雄三的航标，恰恰相反，这是对他思想精神最忠实的继承与发扬。我们是将“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一宏大视角，聚焦于“龙狮”这一具体而微的文化现象上。我们试图证明：

龙狮，是中华文明“基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胞”，承载着其深层的文化基因。通过龙狮这面“小镜子”，我们可以折射出关于共同体结构、情感记忆、身体实践等“大问题”。研究龙狮，就是要确立一种“内在视角”，从它自身的仪式、组织、技艺和情感体验出发，去理解它如何作为一种“方法”，默默地、有效地建构和维系着“我们”的意识。换言之，“以龙狮为方法”，是“作为方法的中国”在具体研究领域的一次落地、一次操演、一次深化。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思想层面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枷锁，更要在实践层面，从我们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解释自身、建构自身的概念与理论。我们的探索，将从这座思想的航标出发，驶向那鼓点激昂、龙腾狮跃的实践大地。“作为方法”，意味着一次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它不再将中国看作一个静止的、被动的客体，而是将其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生产性的视角和出发点。通过这个“中国之镜”，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中国自身，更要重新审视欧洲、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从而在多元文明的比较中，相对化那个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标准，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多元可能性。

这一命题的精髓，在于其主体性的重建与内在视角的确立。它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个文明，必须深入其肌理，从其自身的脉络和实践中，寻找解读它的密码。然而，思想的高塔仍需接通地气。一个以整个“中国”为

尺度的方法，固然宏大，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仍显得有些抽象与遥远。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具体、更鲜活、更富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来践行这种“方法”的精神，并将其落实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具体问题的探讨中？

舞龙运动有“龙形阴柔阳刚之美”、“舞龙技术演练之美”、“舞龙与音乐协调美”、“舞龙运动欣赏意境美”等美学因素，能强健人们的体魄，保持快乐的心情，开发思维，培养美的欣赏能力。旨在为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好地促进人的身心双修提供借鉴，使人的心灵、精神和人格臻于至善。¹未来，让我们“以龙狮为方法”。

三、方法的具象化：为何是“龙狮”

在浩如烟海、璀璨夺目的中国文化符号体系中，我们的选择何以独独钟情于龙狮？这绝非意味着京剧的唱念做打不够典雅，书法的笔墨线条缺乏神韵，武术的刚柔并济有失精深，或是节气的天人合一不够智慧。它们无一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与哲学思考。然而，当我们探寻的是一种能够动态地、具身地、并有效地承载“方法”论重任的文化载体时，龙狮便以其一系列无可替代的、鲜活而强劲的特质，从众多选项中脱颖而出。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或体育，更是一种植根于生活、作用于社会肌理的生命律动。

首先，龙狮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身体性”实践，这是它与许多其他静态或需静观的文化形式最根本的区别。一幅山水画可以悬挂欣赏，一曲古

¹周建新，江宇. 舞龙运动——一种富有美感的艺术符号[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2(6): 131-135.

箏可以闭目聆听，但龙狮，它的存在本身就必須依赖于—群身体的共同激活与协同创造。当鼓槌落下，声波如同号令般穿透空气，那巨大的龙身便不再是竹篾与绸布的造物，而是在十数名舞者肩、臂、腰、腿的精准配合下，被赋予了翻滚腾跃的生命。狮头之内，舞者与道具合二为一，他的步伐就是狮子的步伐，他的张望就是狮子的顾盼。在这里，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将自己的呼吸、节奏、力量，毫无保留地融入一个更大的、统一的节律之中。这种身体在场的绝对协同，创造了一种超越语言的、最为原始而直接的共同体验。它不需要通过教条来宣讲“团结”，而是让每一位参与者在自己的肌肉酸痛与汗水挥洒中，在彼此气息的共振与眼神的交汇中，体认到何为“我们”。这是一种通过千百次重复练习而镌刻进神经末梢的肌肉记忆，一种在节奏同步中达成的集体无意识。共同体意识，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铭刻在身体中的生命状态。

这种震撼人心的身体实践，之所以能超越单纯的杂技或运动而直指人心，在于它同时承载着极为深厚且共享的“符号性”内涵。“龙”与“狮”，本身就是两部行走的、充满力量的文明密码。龙，作为中华民族最具根源性的图腾，早已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地域或族群，它呼风唤雨，象征着自然的伟力；它代表皇权，体现着秩序的威严；它更是一种祥瑞，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它是整个文明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塑造的想象性始祖与精神旗帜。而狮，尽管其生物原型并非中原所产，却通过丝绸之路等文化交流渠道，被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与转化力，成功地“归化”为驱邪避害、带来吉祥的瑞兽。这一对符号，一个源自本土的神话思维，一个来自跨文化的对话，它们的结合本身就生动地述说着中华文明“多元—体”

的构成特性。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共享的意义世界，为所有观看者、参与者提供了一套无需解释便能心领神会的象征基础，使得每一次龙狮的舞动，都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唤醒。

进而，龙狮的舞动绝非随意为之，它总是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生活的特定节点，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功能。从辞旧迎新的春节元宵，到商家企盼兴旺的开业典礼；从社区重要的祭祀活动，到国家层面的盛大庆典，龙狮的出场，往往标志着时间的转折、空间的神圣或事件的重大性。在人类学的视野里，仪式是社会得以整合、情感得以凝聚的核心机制。龙狮的表演，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仪式性戏剧。它的鼓点，如同社会共同体的“心跳”，在特定的时刻规整地响起；它的舞步，如同一种集体的“呼吸”，引导着在场所有人的情绪起伏。通过这种周期性的、可预期的情感动员，共同体意识得以从日常生活的潜流中浮现出来，被一次次地强化、展演和再生产。它使散落的个体情感汇聚成集体的欢腾，将短暂的时刻凝固为历久弥新的共同记忆，从而确保了文化的连续性与社会的凝聚力。

而支撑起这一切的，是龙狮与生俱来的“社群性”基因。纵观历史，一个龙狮队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文艺团体，它更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单元——一个村落、一个行会、一个宗族——的荣誉代表与组织核心。募集资金、组织训练、协调排演、对外竞赛……这一整套运作流程，本身就是一套微缩而完整的社会治理与协作模式的演练。它在一个小共同体的内部，自然而然地锻造着领导、分工、信任与规则。当一个龙狮队舞动时，它舞出的是整个社区的精气神。而当来自天南地北的无数个龙狮队，在全县、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赛会与汇演中同台竞技、相互观摩时，一幅“中华民族”

大共同体的生动图谱便豁然展开：我们既能看到各地风格的千姿百态，更能感受到那种深层的文化认同与血脉相连。正是这无数根植于乡土的小共同体，编织成了宏伟的国族认同的坚实基座。

最后，龙狮还具有一种强大的“流动性”特质，这使它在全球化时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解释力。从岭南醒狮的威猛灵动，到江北舞龙的磅礴气势；从闽台阵头中龙狮与民间信仰的紧密结合，到随着下南洋的先辈远播海外、演化出独具特色的南洋狮团。龙狮的形态虽千变万化，但其核心的精神内核与文化语法却一脉相承。它随着华人的足迹跨越重洋，成为离散族群在异国他乡认祖归宗、维系文化身份的“移动的圣物”与“文化的方舟”。在这个意义上，龙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为珍贵的、非领土性的、基于文化实践的共同体范式。它告诉我们，共同体的联结可以超越地理的边界，通过共同的文化实践与情感归属来维系。这对于我们理解在人口高速流动、虚拟空间日益重要的现代乃至未来社会中，民族认同将如何存续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启示。

因此，“以龙狮为方法”，其深意远不止于研究一种民俗活动。它意味着，我们将这一具身性的、符号丰富的、仪式化的、社群建构的且全球流动的、充满动能的文化实践，视为我们观察、分析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棱镜与关键路径。我们不再是孤立地探讨龙狮本身的技艺高低或源流演变，而是要透过它那奔腾飞舞的身姿，去窥见一个伟大共同体千百年来的形成机制、其内部深沉的情感结构，以及它在当今复杂世界中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未来的命运。透过这面看似具体而

微的棱镜，我们所投射出的，将是关乎“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宏大光谱。正如学者所说的：“激励更多的青年加入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队伍，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韧性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的建构也就有了坚实基础。”²

四、本书的路径：探寻传统体育与现代共同体的接榫

循着“以龙狮为方法”这一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本书将展开一场跨越历史纵深、理论高度与田野温度的综合性探索。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文化现象描述，而是一场旨在叩问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民族共同体之间，那些深刻而精妙的接榫之处。我们将如同一群专注的考古学家与解码者，在龙狮那震天的鼓点与翻飞的身姿中，去发掘、聆听并解读那潜藏于其下的、关乎“我们”如何形成的宏大叙事。

我们的旅程将首先潜入历史的深处，去探寻时间的源流。我们将追问，龙狮是如何从远古蒙昧时期，那与天地沟通、向神灵祈愿的原始祭祀仪式中，一步步蜕形而出的？它又是如何穿越王朝更迭的烽烟，从宫廷的典礼走入市井乡野，演变为凝聚宗族、联结村落、规范行会的强大社会黏合剂？我们尤其要关注，在广袤帝国的边缘地带，在那些多民族交错杂居的“走廊”区域，龙狮的身影是如何作为一种超越语言的无声音符，在迁徙、贸易与文化的互动中流动与变奏。它是否曾作为一套共享的文化语法，既承载着中原核心文化的辐射，也吸纳着地方性族群的智慧，最终成为一条促进文化交流与认同融合的独特路径？解答这些，意味着我们将触摸到龙狮

²倪军，管军，杨淑梅，等. 青年群体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行为逻辑——基于闽西灵地村舞龙的分析与讨论[J]. 体育科学, 2024, 44(2): 77-87.

在漫长时光中，作为共同体“基础设施”的历史根基。

继而，我们的镜头将聚焦于身体的微观宇宙。在这里，我们将凝视那在鼓点指挥下高度协同一致的舞动本身。我们要追问，那抽象的“团结”概念，是如何通过千百次严苛的训练与表演，被一丝丝地刻入一代代舞者的肌肉纤维与神经反射之中的？当十数名舞龙者步伐如一，将巨龙舞动得气势磅礴；当狮头与狮尾两名舞者心念相通，演绎出惟妙惟肖的喜怒哀乐时，这便是一种最为深刻的“体化实践”。它比任何书本上的教条都更具说服力，向每一位参与者传递着关于秩序、协作、信任与牺牲的共同体伦理。在这里，身体不再是孤立的生物体，而是成为了承载和传承共同体精神的活的载体，一种无需言传即可意会的“身体知识”。

从身体的律动中抬起头，我们将仰望那由符号所构筑的意义星空。“龙”与“狮”，这两个充满魔力的意象，是如何超越方言的隔阂与地域的局限，被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域的不同地域与族群的中国人所共同信奉、共享与共享的？它们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岭南的醒狮威猛灵动，江北的舞龙气势恢宏，其间蕴含着何等丰富的地方性诠释与创造性转化？我们试图探究，这一对强大的文化符号，是如何为亿万陌生人提供一个共享的象征体系，从而成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那个“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孕育和维系的神话温床与情感纽带。当然，我们的探索必须直面现代的复杂场景。当支撑传统龙狮活动的乡土社会结构在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渐松动与瓦解时，龙狮自身的命运又将如何？我们看到，它正以一种强大的文化韧性，从乡土的仪式场域，昂首走向国家级的庆典舞台、大

中小学的体育课堂、商业化的旅游景点以及竞争激烈的国际化赛场。总之，舞龙习俗作为托付着广大民众情感的民俗事象，正如“强化仪式”。³在这一转型中，龙狮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使命：它既是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构建国族认同的鲜活载体，也是发展“体育产业”、激活地方经济的文化资源。本书将仔细审视龙狮在这双重乃至多重叙事下的适应、调适与创新，看它如何在与现代性的对话中，既保留了文化的精神内核，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最终，我们的视野将投向全球的广阔图景。在纽约、伦敦、吉隆坡的唐人街，那铿锵的狮鼓之声，为何能与广东乡下祠堂前的鼓点，唤起海外游子与故乡同胞同一种深沉的文化共振与血脉亲情？龙狮，作为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护照”与“移动的故乡”，是如何成为全球华人跨越政治边界与地理阻隔，实现文化寻根、身份确认与情感联结的最强劲音符？它演示了一种基于共同文化实践，而非固定领土疆域的“离散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这对于在全球化时代重新理解民族认同的未来形态，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范式。

龙狮，绝非陈列于博物馆玻璃柜中、仅供凭吊的文化标本。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活着的、呼吸着的、时刻在与时代对话的、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的“共同体引擎”。它以一种极具感官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的方式，生动地演示了古老的文化传统如何能够，并且正在，为现代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来自历史深处的宝贵资源与澎湃动能。

³威廉·A·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鹏,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406.

五、结语：迈向一种动能学的共同体理解

“作为方法的中国”如同一把锋利的哲学手术刀，精准地切断了长期束缚我们思想的无形枷锁——那种将自身文明视为被动客体、等待被外来理论所定义和裁定的思维惯性。它为我们夺回了文化阐释的自主权，让我们得以用一种源自本土、回归内在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与未来。这是一场认识论上的伟大解放。然而，思想的解放若不能触及大地，终将在半空化为云烟。而今，我们所倡导的“作为方法的龙狮”，正是希望将这一高屋建瓴的哲学视角，转化为一条可以行走、可以触摸、可以沉浸其中的实践路径。它是一条连通思想殿堂与生活现场的桥梁，是一场不仅叩问我们头脑、更直击我们灵魂与血肉的探索之旅。

它因而是一种诚挚的邀请，邀请我们暂时放下那些虽然严谨却难免僵化的理论框架与概念图谱，转而调动我们全部的生命感官，去亲自贴近那龙狮舞动的现场：去倾听那如心跳、如号令般振奋人心的鼓点，它如何统摄全场的节奏，让散乱的个体步伐汇成统一的生命律动；去凝视那在阳光下闪烁、在人海中穿梭的灵动翻飞的身姿，看龙如何借众人之力展现其神威，狮如何凭二者之默契演绎其性情；去感受那训练房中汗水浸透衣背的坚持，那表演成功后与同伴纵情欢呼的喜悦，以及那围观人群中爆发出的、同频共振的喝彩与感动。正是在这样全然投入的感官体验与情感共鸣之中，我们或许才能超越一切抽象的论述，找到关于“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最生动、最直接、也最无可辩驳的答案：我们，是一个能够在共同的节奏中精确协同、翩然起舞的群体；我们，是一个能够在共享的龙狮符号下瞬间达成理解、产生认同的文化子孙；我们，更是一个通过在年复一年、循环不

息的节庆仪式中反复参与和体验，从而将共同体意识深深镌刻进生命年轮的命运集合体。这是一种在动感中生成、在协作中巩固、在情感中升华的认同。

“不管是从民俗体育的空间再造、文化再生、功能拓展以及仪式重塑等方面，都显现出一种‘变迁中寻求再生’的态势。”⁴因此，这本书，从本质上说，就是这样一次郑重其事的邀请。它邀请您，亲爱的读者，一同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怀着一种近乎现象学式的“悬置”态度，全身心地进入龙狮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文化世界。我们将以它为方法，作为一种观察的棱镜、一种思考的刻度、一种感受的媒介。最终，重新认识那个我们身处其中，日用而不觉、习焉而不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它并非一个遥远的政治概念，而是活跃在我们的节庆里，传承于我们的身体中，回荡在我们的鼓点上，并闪耀在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里。

⁴雷学会，龙行年，徐剑，等. 变迁中的再生：民俗体育在城市空间运行机制研究——一个舞龙习俗的田野调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5): 62-71.